



一九八六年

第二辑

(总第14辑)

编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

齐市铁路印刷厂

2	我是怎样做文史资料发行工作的……………孙喜
6	告读者……………文史办
5	伪满时期移民的苦难……………贾洪阁
7	轰动一时的“割肉疗亲”……………张振芝
8	我所知道的依安伪兴农合作社……………王文超
10	齐齐哈尔乐天照像馆……………傅瑞云
13	三道镇军民抗击日军纪实……………黄庆福
	曲禄福 梁亦征
14	万宝山红枪会抗日灭匪记……………曲禄福 梁亦征
16	“日本沟”的由来……………郑墨庚 杨树明 马云
19	抗联在克东的几次战斗……………赵景林
21	抗日烈士田绍文……………姜黎
22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温向前
25	抗联攻打长春镇警察署……………曲禄福 梁亦征
26	抗联夜进通宽镇见闻……………王衷心
27	陶子祥同志抗日斗争二三事……………单致国
30	夜袭克山……………刘国成
34	抗联夜袭曹家岗……………曲禄福 梁亦征
36	狱中斗争……………张洪杰
40	王怀怒杀伪警务科长包文海……………博彦
42	李海青考略……………王希亮
50	追忆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的战斗生活 ……………田琳
53	谋杀……………〔日〕中岛宗一
58	齐市一中的日本学生……………彭立
60	《齐齐哈尔市政概要》简介……………常立人
封二	纪念“六一三”事件五十周年 死难英雄永垂不朽 (照片)
封三	平阳镇革命烈士纪念碑……………甘南县政协提供
封底	平阳镇革命烈士纪念碑(照片)



一九八六年

第二辑

(总第14辑)

编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

齐市铁路印刷厂

2	我是怎样做文史资料发行工作的……………孙喜
6	告读者……………文史办
5	伪满时期移民的苦难……………贾洪阁
7	轰动一时的“割肉疗亲”……………张振芝
8	我所知道的依安伪兴农合作社……………王文超
10	齐齐哈尔乐天照像馆……………傅瑞云
13	三道镇军民抗击日军纪实……………黄庆福
	曲禄福 梁亦征
14	万宝山红枪会抗日灭匪记……………曲禄福 梁亦征
16	“日本沟”的由来……………郑墨庚 杨树明 马云
19	抗联在克东的几次战斗……………赵景林
21	抗日烈士田绍文……………姜黎
22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温向前
25	抗联攻打长春镇警察署……………曲禄福 梁亦征
26	抗联夜进通宽镇见闻……………王衷心
27	陶子祥同志抗日斗争二三事……………单致国
30	夜袭克山……………刘国成
34	抗联夜袭曹家岗……………曲禄福 梁亦征
36	狱中斗争……………张洪杰
40	王怀怒杀伪警务科长包文海……………博彦
42	李海青考略……………王希亮
50	追忆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的战斗生活 ……………田琳
53	谋杀……………〔日〕中岛宗一
58	齐市一中的日本学生……………彭立
60	《齐齐哈尔市政概要》简介……………常立人
封二	纪念“六一三”事件五十周年 死难英雄永垂不朽 (照片)
封三	平阳镇革命烈士纪念碑……………甘南县政协提供
封底	平阳镇革命烈士纪念碑(照片)

我是怎样做文史 资料发行工作的

龙江县政协 孙 喜

我们龙江县政协没有文史资料专职干部，在人力不足、没有资金、没有充足发行时间的情况下，通过代销的形式，一九八四年底以来，发行《黑龙江文史资料》一千多册，《吉林文史资料》一千六百多册，《江苏文史资料》五百二十多册，《浙江文史资料》三百七十册，《哈尔滨文史资料》七百六十册，《齐齐哈尔文史资料》一百四十册，共发行了四千三百九十册，取得一定成绩。但因为发行形式单一，所以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的发行工作，仍是大有潜力，大有可为。下面我谈一谈对发行工作的体会。

一、提高认识，增强工作的自觉性

我的发行工作由不自觉到自觉，是有一个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的。

刚开始，我觉得政协不是发行单位，搞发行工作是份外的事，你去送书，人家能欢迎吗？黑龙江省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使我受到了教育和启发。会上传达了全国政协八五年召开的文史办公室第一次主任会议精神，提出了不但要搞好编辑文史资料的协作，还要初步建立政协内部发行网，搞好发行工作的协作。通过这次会议，使我认识到文史资料的发行工作，不仅不是份外的事情，而是必须搞好的本职工作，应该搞好。由于县政协没有资金，解决文史资料书籍的来源问题就摆在面前了。我抱着试试看想法，向来函联系发行工作的单位复信，说明了我县政协经济不独立，只能采取

代销的办法，书销完后付款。我想人家不会赊销的，出乎意料，复信的几个省市文史办，同意代销的办法，于是都把他们出版的文史资料寄来了，这是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也是对发行工作的支持，真是“全国政协是一家”，我下决心搞好发行工作。

书源不成问题，发行有了决心，但好不好发行，读者欢迎不欢迎文史资料，对这些问题心中无数。

当县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时，县直机关各大系统党委书记都参加会议，趁此机会，请政协领导在会上讲文史资料的重要作用，文史资料的内容和发行工作，并号召各单位订阅文史资料。由于县政协领导对文史资料发行工作的支持，各单位纷纷订阅，五十套《黑龙江文史资料》一销而空。各党委负责同志都表示要做长期订户，并订购了其他文史资料。各党委书记这样重视，打消了我的顾虑。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依靠各级党委，什么工作都好开展。以后，《哈尔滨文史资料》、《吉林文史资料》、《江苏文史资料》、《浙江文史资料》陆续发到后，因为是内部发行，直接把书送到各党委，受到他们热情接待，并赞扬我不辞辛苦送书上门。他们不仅把书欣然留下，而且一再嘱咐：“再来文史资料别忘了我们。”

发行文史资料以后，反响很好。有的说：“真不知道你们政协还卖书，这些书在书店买不到，有你们这条路子，就不难买了。”解决了买书难的问题。

读者对文史资料很欢迎，因为它是文史并茂，生动翔实，不象单纯史料那样枯燥。《黑龙江文史资料》中的抗联史料，受到各界的欢迎；《哈尔滨文史资料》中的工商史料，特别是关于同记商场武百祥的史料，受到商业财贸系统干部的欢迎；《黑龙江文史资料》和《齐齐哈尔文史资料》中的马占山江桥抗战等文章，《吉林文史资料》中的溥仪的后半生、流浪的王妃等史料，《浙江文史资料》中蒋介石的史料，也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县志办的同志说：“吉林省编的《东北大事记》、《‘九、一八’亲历记》是我们史志工作者不可缺少的资料，资料难得，非常珍贵。”我县史志办的几位编辑，人手一册，当作工具书使用。学校反映：“《不能忘记的历史》（《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使他们憎恨军国主义，对帝国主义不能丧失警惕。”

事实教育了我，使我担心不好发行，怕不受欢迎的思想得到了解决。由于文史资料工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既起到了发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又起到了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作用。它以“三亲”史料为内容，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的腐败没落，新中国诞生的必然，记录了反动派的卖国史，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救国史，充分说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千真万确的真理。因此，它不但成为深受欢迎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也成为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师的参考书，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文史资料就成了大受欢迎的畅销书。

发行的实践，也使我认识到广大读者喜爱文史资料这是一个方面，不同的读者对文史资料的口味不同这是又一个方面；各地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又都具有地方特色，怎样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满足不同读者的要

求的问题必须解决。读者对《黑龙江文史资料》、《吉林文史资料》和哈、齐文史资料就欢迎，因为有东北地方特色，而对关内和南方文史资料的需要量就小，只作为图书馆、资料室藏书用，就是外地文史资料也不是都不受欢迎，《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蒋介石史料专辑》就很畅销，光这一辑就销了一百五十本。为此，我在进书时，受广大读者所欢迎的、能够畅销的就多订，否则就少订，同时根据所联系的单位多少，销量多大，有计划地进书。这样，既保证了不积压，又扩大了发行量。总之，业务实践使我逐步提高对发行工作的认识，从不自觉到自觉，做到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发行工作。

二、调查研究，确定发行对象

根据初步调查，发现文史资料受到下列单位和读者的欢迎，并由此确定了文史资料发行的重点对象。

首先，受到政协委员和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部门的欢迎。政协委员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爱读书，阅历广，求知欲高，古今中外都想知晓，因此，他们对政协自己编纂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很有感情，争相购买阅读，并作为撰写当地文史资料时纠正谬误的根据，提供征集史料的线索。所以，政协文史部门需要大量的文史资料。

第二、受离退休的老干部欢迎。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脱出来或退居二线，能有更多的时间读文史资料，用为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写回忆录的参考资料。

第三、图书馆、档案馆、各单位资料室、老干部活动室、史志办、党校等很需要各种图书资料。文史资料由于是内部发行，因而，他们买不到，县政协向这些单位发行，他们是欢迎的。

第四、学校教育（主要是中学）和历史教师非常喜欢文史资料。因为它是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也是历史教师的教学参考资料。

第五、企事业单位也欢迎文史资料。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开展读书活动，武装“工人之家”，都认为文史资料是好书，是必备之书，因此，他们都愿意购买。

根据如上的调查，作到了心中有数，确定了图书馆、档案馆、县志办、党校和各大系统党委、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大的企事业等单位；政协常委、政协委员、中学以上的历史教师和县志办的编辑等人员为发行的重点单位和对象。

根据发行的对象，一年来我向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县政协常委发行了五十套文史资料；向各大系统党委发行了三十套；向基层企事业单位发行了二十四套，其余是零售给个人了。

三、掌握特点，开通发行渠道

文史资料就其内容来说，以“三亲”史料为主；就其性质来说，是内部资料，以内部发行为主。这个特点决定了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的渠道有其独特的方式和特点，那么怎么发行呢？我是通过如下渠道进行的：

一是搞好政协内部的发行。根据日前政协经费紧张的特点，我县政协只给政协常委订阅了《黑龙江文史资料》、《哈尔滨文史资料》和《吉林文史资料》，通过政协的会议，在会上向政协委员发行一部分文史资料。

二是对于确属工作需要的单位，保证工作用书，如县志办、档案馆、图书馆、党校和各党委的资料室、老干部活动室。在基层企事业单位中有政协委员的，我都送书上门，这样，保证了文史资料内部发行的性质，基本上满足了单位的需求。

三是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动员领导带头购买文史资料。我向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府办公室推荐文史资料，他们一次就为县团级领导购买了三套《吉林文史资料》，他们外出开会、下乡工作时，有的也带着文史资料看，这样，就替我们做了宣传工作，很多人到政协来购买文史资料。

四是对有特殊情况的对象发行，采取赠阅的办法。离退体的老领导，前政协主席、副主席、常委；有的单位亏损，无钱买而又很需要，我就赠给这些单位和个人，从代销费中核销了。有时为了宣传的目的，来了熟人向我要书，我就给他几本，以便宣传，扩大发行面。我就掌握一条，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搞社会效益，所以，不赔钱就行。

由于我一人既抓学委会工作，又抓文史工作，还兼政协办公室部分秘书工作，天天搞发行工作有困难，另外书也到的不那么及时，所以，我采取定期送书的办法，暂定每季度发行一次，一次需五天左右的时间。也可结合工作随时发行。在走访委员、调查研究时，在政协会议上，随身带去文史资料，在政协内部随时发行，保证了委员能及时看到文史资料。

虽然我的发行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只是初步尝试，不但有很大潜力可挖，而且还要建立必要帐目，以考察经济效益。由于我县政协人手少，没能办文史书店或书床，没能面向社会广大读者，目前只有送书的一种形式，影响了发行量。另外，发行工作只限于县城，各乡镇的资料室、老干部活动室，中学都需要文史资料，还有联系，因此发行工作大有潜力可挖。

我一定在省、市政协文史办的领导和支持下，继续搞好县级政协发行工作，为建立三级发行网而贡献力量。

伪满时期移民的苦难

贾洪阁

我是在日伪统治时期，被迫带领百户贫苦农民，从伪锦州省黑山县移民来到依安的。今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刻，不能不引起我回忆往昔移民的苦难。

日伪统治者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制订了“防苏反共”、“北边振兴”的政策，强制从锦州、承德一带向黑龙江省迁移贫困的农民，从事垦荒种地。一九四五年我任伪黑山县劝农模范农场的农业技士。当时县公署强令我为垦荒队的带队人，和移民中的队长互相配合，带领一支移民垦荒队伍迁往依安。命令不敢违，只有照办。

对迁民的对象和要求是苛刻的。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按自然屯摊派，每屯必去一户有劳动力的最贫困户；二是被迁的移民户必须全家迁走，鸡犬不留；三是已被确定必去的户如果不走，必去劳工，死活不管。在这样强迫的条件下，被迁者绝大多数是本屯中的最贫困户。此外还有的是由于惹了事，如打骂了警察，惹了官府，为躲避是非而自愿迁走的。也有的是生活无依靠的单身汉随亲友而迁移的。就这样组成了一支一百三十户，近五百口人的移民垦荒队，待命出发。

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一天，黑山县火车站，数以千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在一片哭涕声中，告别了自己的故乡。

不知走了多少里程，火车到达了郑家屯站，准备换乘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在郑家屯下车之时，天已昏黑，就象战时难民一样扶老携幼，孩哭母叫，有少数的去街内投

宿，有的住在候车室里，大多数夜宿站台与星月同眠。老者哀声叹气，壮者无精打彩，幼儿啼饥号寒。距街数里之遥，买不到食物，只好饮水充饥。直到翌晨，才算买到了食品。

汽笛一鸣，来了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移民一拥而上。在整个途中，几百人乘坐一节车箱，就象载货一样，座席、通道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行程几千里，长途乘车不得安眠，年轻人还可，老幼奈何！更为可恨的是铁路警察极其凶恶，把移民随身携带的一点棉花、大布，甚至花生米，几乎搜掠一空，归为己有。真是逼得贫困的移民生活无路。

人们在饥渴疲惫的困境中挣扎。一天上午火车到达了依安车站。下车之后，冻手冻脚，寒风刺骨，真难忍受，当时的伪县公署实业科开拓股派了几名职员，迎接我们，随即送往城内西门里一家大车店（肖家店）。住的虽然是南北大炕，可是冰冷寒彻；吃的是每顿稀粥一碗，怎能饱腹充饥。加之一路饮食不足，睡眠不够，老者思乡，幼儿饥寒，就这样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纷纷病倒，小儿童相继生病，不到几天两名老人病故（一男一女），数名儿童死亡。当时伪政府不管，移民在依安举目无亲，向谁求救，既无钱就医，又无力埋葬，只用苇席一卷，埋葬于北门外冰天雪地之中；小儿是用谷草一捆，送之城郊，为犬充饥。真是哭天无路，呼地无门，黎民百姓无可奈何！

在大车店住了七天，伪政府下令除我被留在实业科外，其余农户一律送往农村。在寒春冰雪里乘坐大铁车，开赴百川村（今中心乡）按自然屯分六户或十二户，每六户给一付大犁，四十五垧荒地（一方），每户分给一匹马（好马已被换走）。每户住到当地户的一铺炕，吃的是配给的高粮米。到各屯之后，因春垦荒不能种，加之移民不懂开荒技术，大多数租种熟地，从事生产。也有的移民户男的给大粮户扛活，女的给大粮户缝连洗补，较大的孩子给大粮户放猪，还有的到外地做手工活，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过着难以维持的生活。令人最受感动的是，当地农民兄弟，看到移民之苦，在生产上教技术，在生活上给帮助，有的送酱菜，有的送米面，有的送烧柴，有的送小孩衣帽，还有在节日里送肉的等等，在屯邻的关怀下，移民老小的生活才算得到安定。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祖国光复后，在动乱之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民主政府成立后，移民户和当地群众一样，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开始过上幸福的生活。

依安县政协供稿

（上接52页） 也没有悲伤，愤怒地蔑视着那些刽子手日本鬼子，昂着首，挺着胸，战斗到最后。在囚车上，一路他高唱着《国际歌》，高喊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没关系，老爷现在二十六，再过二十年我的孩子长大了，又出来一个金剑啸！”

我听到金剑啸同志就义的消息太迟了。跑到刑场，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只听见滚滚的嫩江水在为他控诉！

萧萧的秋风在为他悲泣！

告 读 者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三、四辑，将于第四季度出版朱庆澜先生的合刊史料，特此敬告。

市政协文史办

我禁不住的泪水从手缝中滴落！

听说他没人收尸，也没有坟墓，没有碑文。他的女儿金伦、女婿里栋到齐齐哈尔寻查，知道有人收尸，也有坟墓，在齐齐哈尔南郊。可是现在那墓早已平了，还是没有墓。

今年是金剑啸同志逝世四十三周年，我写这篇文章来悼念他！

金剑啸同志安息吧！你的坟墓是建筑在人民的心中，你的丰碑也刻在人民的心中！

1979年10月26日

转载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轰动一时的

“割肉疗亲”

张振芝

日伪统治者为使青少年变成驯服的奴隶，竟用封建、迷信、崇神和宿命论等唯心主义观点教育学生，并大肆宣扬忠孝节悌等思想，有些青少年深受其害，女学生孔祥桂就是其中的一个。

孔祥桂是伪依安县公署庶务科庶务股长孔繁文之女。一九四〇年（康德七年）她在依安（依龙）文化国民优级学校（即高小）一年级学习。母亲李秉珍常年有病，多方医治不见效果，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年龄都小，年仅十四岁的孔祥桂素来要强，除学习外既要协助父亲操劳家务，又要耐心地求医取药侍奉母亲。不论她怎样心急如火，但母病仍不见好转。忧心忡忡的孔祥桂，在封建迷信思想教育的毒害下，便向“老佛爷”求拜。

这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孔祥桂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背着父亲和弟妹，用准备好的手工刀，从左臂上割下一平方厘米多的皮肉。她简单包扎之后，将这块肉放在小碟里，捧供到高悬在墙壁上的佛龛内。然后她忍着疼痛点上香火，边叩头边小声的祷告着：

“老佛爷看我当女儿割肉上供的诚心，乞求您保佑母亲的病快好，长寿呀！”她反复地

叩头、祷告之后，起来擦去滴落的血迹，又作了厚厚的包扎，才躺卧在炕上。

次日孔祥桂在学校的教室里闷坐，下课不出屋，面带痛苦的表情，并不时地向左袖内塞纸擦拭，然后在袖内揉成纸团扔进课桌里，还带有血迹。附近的女同学发现之后问她怎的啦，她只是搪塞地说“挠破了”、“针扎了”等等。经要好的同学再三追问和亲眼看了伤口，孔祥桂才说了真情。于是同学立即报告给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立即询明后转报给校长，校长又亲自问视后认为这是学校教育的成绩，便报告主管教育的行政科。行政科指示赶快去医院治疗，并认为这是孝行，模范，当即向县长呈报。

时隔一周，学校院外的广场搭起了临时木板台，各机关团体的职员，学校全体学生和商市民等一千多人共同参加了“奖励孝女孔祥桂大会”。伪官员们前边就坐，伪县长讲了话，表扬了孔祥桂的孝心行动，号召群众向“割肉疗亲”的孝女模范孔祥桂学习，并奖给了梳妆用品、衣物、文具等。这件事把城乡弄得沸反盈天。

事过之后，人们议论纷纷，反映不一。啧啧称赞者有之，但为数很少，摇头摆手者有之，虽为数居多但不敢公开评论；公开反对者亦有之，但甚少。当时的伪警务科长刘日升外出回来，听说之后大嚷着说：“‘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种‘割肉’的办法，算什么孝？”刘日升对孔祥桂违反“圣人训”的做法虽然大力不满，但并非反对这种封建迷信的思想意识。

孔祥桂自造了痛苦，除得到“孝女”的奖励和惹得父母的“心疼”外，对她母亲病情的好转未收丝毫裨益。

依安县政协供稿

我所知道的依安伪兴农合作社

王 文 超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期间，既实行政治压迫，又进行经济掠夺，伪满的兴农合作社，就是日伪政权掌握农民经济命脉，掠夺人民财物的组织机构。它遍及伪满各县的城乡，从多方面控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兴农合作社”是由原来的“金融合作社”和“农事合作社”合并而成的。一九三四年（伪康德元年）根据伪满国务院《金融合作社法》成立了依安县金融合作社，地址在依安（现在的依龙镇）西北街，全社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个日本人，理事是额田卓一。按照《金融合作社法》的规定：由伪国家出资和动员农民出资，将出资的农户作为“社员”。这个所谓的金融合作社，称其性质是“为使社员经济发达，对社员进行经济图兴……”，它的任务是办理社员的储蓄存款，在有人担保的情况下，向社会贷款；非社会贷款，必须用《土地执照》作抵押。到一九三八年（伪康德五年）末的统计，依安县共有社员4,619人，存款达伪满的“国币”144,000元，贷款伪币214,000元。这种贷款在当时虽然对遭受侵略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有些扶助作用，但对那些无有《土地执照》可作抵押的贫苦农民，仍然是没有任何补救作用。

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成立依安县农事合作社，地址在县公署院内（现依龙镇），理事长是日本人井上荣司。伪国务院发布的《农事合作社设立纲要》中说：“根据国家的计划，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政府的统治下，谋求农业的福利，与此同时为农产品配给圆满进行，与一般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适应地方的情况和发展的情况，继续将农业者组织起来，使之设立农事合作社。”其中美其名曰“促进发展”、“谋求福利”，

实际上就是进一步控制农村经济命脉，全面统治农产品的收购、贮运、加工、销售，严格管理农业仓库和农产品交易所等。

一九四〇年（伪康德七年）四月一日，伪国务院又确定“金融”、“农事”两社合并，更名为“兴农合作社”，继续承办两个社的业务。依安县同年也将两个社合并，在原依安县（现依龙）西北街金融合作社的后院新建一所大办公室，扩大了规模。伪县公署迁到泰安镇（今依安镇）之后，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兴农合作社也随之迁到泰安，在依安村设支社。兴农合作社迁到泰安城内，最初在南门里路东（现家畜卫生院）设办公室，第二年（伪康德十年）又在东南二道街新建一处大办公室，组织机构日益庞大。

开始改名时，仍由“理事长”为直接领导者，以后伪满国务院又规定伪县公署、协和会、兴农合作社实行“三位一体制”，县长、副县长为正、副社长，负领导责任，理事长负责常务工作。依安县兴农合作社的首任理事长是伊腾勇，继任的有濑田武士、外川米藏，大町一郎左卫门等人（其组织机构附表见24页）。

理事长室有理事长一人，理事二人协助理事长工作，下属各部有部长一人，各系有系长一人。一九四二年的总人数达九十一人，其中日本人十人，主事、部长均由本人担任。

指导部：负责指导各村、屯的“兴农”业务工作。当时依安村有一个村社，其余各村有办事处或筹备处。各行政村下属的屯建立“兴农会”，由屯长担任兴农会会长。据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的统计，“兴农

会”达一百六十个，占全县屯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二，“社员”达一万零六百九十二户，占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可以说兴农合作社的职权范围很广，深入到农村各个方面。

农事部：负责推广农业技术，改良农具和改良种子；管理泰安街和依安村两处的“原毛皮收买所”。

购买部：负责发放农民交“出荷粮”时所“配给”的棉布、棉花、豆油等物品。

贩卖部：管理泰安、依安、富海三个“农产品交易场”；并收购谷草、燕麦等，供给日伪军需之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逐步枯竭，加紧对东北人民掠夺，伪满政府发布《农产品强制出卖法》，年年由“县粮谷出荷委员会”制订“粮谷出荷方案”，春季跟农民订立“粮谷出荷契约书”，按农户种地数量，硬性规定产量，并让农民在“契约书”上按手押或盖章。到秋后，由伪县公署、协和会、警察署、合作社以及村公所等组成“粮谷出荷督厉班”，下乡向农民按“契约书”上的粮数要“出荷粮”，由贩卖部的交易场对农民的“出荷粮”进行检查验收。

信用部：负责办理农民的储蓄存款事宜，存款的种类有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零存整取等。初期群众存款是自愿的，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政府为了加紧经济掠夺，强迫推行所谓的“必胜储蓄”，农民卖粮时不全部支付现款，按比例硬性扣留一部份为“必胜储蓄”，名义上说是按时还本付息，但到日寇投降时，所有的储蓄全部作废。“八·一五”前，全县“必胜储蓄”额达伪币583,908元，老百姓蒙受巨大损失。此外，信用部还办理春耕贷款和小农贷款。据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的统计，全县各种存款的总数是伪币427,503元，同年贷款总数是伪币338,528元。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下，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尤其在伪满末期，日寇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后方的农民百姓也就更加遭殃。日伪政权利用“兴农合作社”这个搜刮农民的桥头堡，除了掠夺“出荷粮”之外，还征用谷草、燕麦、线麻、干菜等等，真是各科摊派，名目繁多，企图把农民的血汗压榨干净。因而广大农民都气愤地把“兴农合作社”叫做“坑农活作孽”，这充分表达出农民受压迫的痛心声。

兴农合作社的内部为了培植亲日势力，强化统治机构，更重阶级服从，等级森严，丝毫没有平等与民主的气氛。从民族来说，当然日本是上等人，其次是朝鲜人，满蒙汉族是下等人。在职务上分，有理事长、部长、系长；在级别上又分为理事、主事、司事、事补、雇员、佣员和临时雇员等，担任部长职务的必须是主事、司事级以上的人，担任系长职务的也有司事或司事补的人，雇员只能做一般工作，临时雇员是任用三至六个月的临时工，到期就可以解雇，但如果能力很强也有少数转为正式雇员。佣员就是工人，做勤务杂役。所有人员的工资待遇都是按照职务的大小或等级的高低而定，多则每月挣100多元，少则只挣20元左右。

在兴农合作社内部由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严重，多数人在日伪统治下，敢怒而不敢言。一九四三年，兴农合作社金库室失火，其中装有帐目和伪币等，由于扑救及时损失不大。可是在这次失火之后，除日本人之外，合作社的中国人，几乎全被轮番审讯，弄得人人自危，坐卧不安，不知何时被抓为“思想犯”。当时的职员苏子频就是受害者之一，被打得遍体鳞伤，险些丧命。回想起来，在日寇的铁蹄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痛苦的。

依安县政协供稿

齐齐哈尔乐天照像馆

傅瑞云

一九二九年三月，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雷家胡同西头路北，即雷家胡同二号，新开设了一家照像馆，名叫“乐天照像馆。”因为业主姓孙，又用乐天做商号，所以人们都称照像馆的经理为孙乐天。

孙乐天（1901—1980），又名王顺、孙德轩、孙培德、孙子健，山东寿光人。因家庭出身贫苦，他的父亲被迫出去闯关东挣钱，可是一去多年无音信。他的母亲便带着年幼的乐天出来寻找，一直到黑河也未找到。于是母子俩就在黑河一家白俄人开的照像馆里做活，到了十六岁时，他就在这家

照像馆学徒，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俄国话，满徒后孙乐天便带着母亲前去哈尔滨自谋生路。到了哈尔滨之后，由他出技术，于松涛出钱，两人在哈尔滨合开了“于松涛照像馆”。一九二六年，他离开于松涛照像馆，在哈尔滨道里自己开设了“乐天照像馆”。在于松涛照像馆时，孙乐天就和师兄弟谭连成关系处得很好，所以孙乐天开了照像馆后，谭连成就到他的照像馆当了工人。在这期间，孙乐天认识了中共党员韩乐然（朝鲜族），并通过韩乐然结识了中共党员苏子元同志，苏子元看到孙乐天是一个正直有为的

青年，便在接触中经常给孙乐天讲述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的进步思想，启发他的思想觉悟，所以使孙乐天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扩大生意，一九二九年三月孙乐天又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开设一处“乐天照像馆”。第二年，谭连成也带着家眷由哈尔滨来到齐齐哈尔协助孙乐天经营这个照像馆。谭连成是一个对内懂业务，对外又能支撑门市的场面人物，因此他把照像馆搞得很兴旺。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东北，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便于开展抗日工作，苏子元同志当时接受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领导，由哈尔滨来到齐齐哈尔开展工作。东北人民面临着生死关头，孙乐天便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主动提出将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处照像馆交给组织使用，这样从一九三二年二月起，乐天照像馆就成为苏联红旗军司令部地下军事情报站的一个据点。在苏子元同志的领导下，孙乐天和谭连成共同担负起地下情报据点的工作。这个情报据点在国际上受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部齐齐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的领导，同时与东北抗日联军有着密切的配合，它的任务是掌握和搜集日本在中国东北一带的军事活动情报。这个情报点在成立的四年中，为苏联红军在中国战场上顺利消灭日寇，取得彻底胜利，提供了珍贵的军事情报和大量准确的资料，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二

一九三二年四月，上级派孙乐天回哈尔滨做地下工作。谭连成则留下担任乐天照像馆经理，负责掩护情报站的工作，保管着情报站用的电台、手枪和小型照像机等，情报站的负责人苏子元就住在乐天照像馆隔壁的一个院子里。苏子元随时把收集到的情报用

电台直接向苏联伯力边区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拍发。谭连成的家属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从事掩护工作，保护着情报站的安全。当时照像馆除了孙乐天 and 谭连成之外，还有副经理王寿亭、会计傅华涵和学徒的宋金鑫、梁明志、孟宪腾（王、傅、宋、梁、孟都是我市照像业职工，现除孟宪腾退休外，其他人已故）。照像馆的伙计们有时看到孙乐天、谭连成夜间从事一些翻印和冲洗胶卷的工作，觉得这里面有说道，但由于孙乐天平时就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以他们认识到这两位经理的工作可能与抗日有关，因此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各方面给予掩护。在这期间，孙乐天经常来往于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进行传送情报等活动。在敌人严密控制的情况下，通过乐天照像馆搜集到的情报有齐齐哈尔至黑河间的铁路桥梁、铁路公路线路、军用设施等情况；有伪军区人员的编制、番号和兵种、兵力和武器装备情况；有日寇驻军调动、换防、日军高级将领调换等各种情报。乐天照像馆情报站能够得到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主要是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来搜集的。如地工人员白瑞就是通过关系打入伪满警备司令部当了上尉情报参谋，在敌人的内部从事情报工作的。他搞到敌人机关兵营照片、文件时，转交给乐天照像馆翻印。情报点把得到的情报，能用电报拍发的就拍发，不能拍发的，就通过交通员送往苏联。当时和乐天照像馆有工作联系的还有地工人员杨允中（龙江医院院长）、周泰（龙江医院的厨师），有在齐齐哈尔铁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梁梓桥、傅申，以及交通员李庆丰、纵精博（齐齐哈尔情报站第二任负责人）等人。人们看到韩乐然同志也经常来这里。

乐天照像馆为了搜集日寇更多的可靠的情报，同时也为了便于在敌人的口中能探听

到各种消息，他们很注意开展社交活动。经理谭连成经常和日本宪兵、特务、警察在照像馆里打牌、吃喝，使乐天照像馆在表面上和伪满机关的关系搞的很融洽，显得很有来头，一般特务、警察也很少前来找麻烦、闹事。这样一来日本宪兵司令部、警察局或伪满机关拍集体或个人照，自然就成了乐天照像馆的一部分营业了。当时的乐天照像馆，在黑龙江省城看来也是比较有名望、生意很兴隆的。

三

两年当中，由于孙乐天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了培养他，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旬组织派孙乐天到苏联海参崴列宁党校去学习。同年八月，住在齐齐哈尔乐天照像馆附近的情报站交通员李庆丰，因发觉特务对他有了怀疑，未经组织同意就私自逃跑了。由于李庆丰平时常到乐天照像馆来，所以特务就开始注意起谭连成，为了防止意外，苏子元马上把电台进行转移。第二年三月，苏子元便去了苏联。从这以后，乐天照像馆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时常派特务前来监视谭连成，到了一九三六年时，敌特的监视愈加严厉，情况十分危险。上级组织因而决定停止这个情报站的活动，谭连成奉命带着部分照像器材在敌人大搜捕的前三天领着全家去了北平，利用乐天照像馆的部分资金和自筹一些资金，在西长安街开设了一个照像馆。为了珍惜他和师兄弟孙乐天的友谊，取名叫“天成照像馆”。

谭连成转移后，孙乐天的母亲从哈尔滨来到齐齐哈尔，把乐天照像馆兑给了该店的伙计。从此，齐齐哈尔乐天照像馆改名为“海波照像馆”，以后又改名为“文波照像馆”，现在地址已成为中市场厂矿批发部。



孙
乐
天
照
片



谭
连
成
照
片

四

孙乐天于苏联海参崴列宁党校学习期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同情小组（苏联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九三六年向苏共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同年八月，他由海参崴列宁党校被调到伯力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科受特种训练。经过在苏联的两年学习和训练，一九三七年一月，孙乐天与苏子元同志一起由苏联到北平谭连成开设的“天成照像馆”，并很快地在天成照像馆建立了电台，天成照像馆成为北平苏联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情报站。不久，苏子元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回苏联伯力，北平的地下工作由孙乐天负责。直到一九三九年，苏联国内搞肃反运动，因而情报站与苏联方面断绝联系。

一九四二年八月，北平日寇实行大搜捕，因有个从齐齐哈尔去的熟人给日寇当了狗腿子，检举了谭连成，谭连成受怀疑而被捕。同年十月在保定工作的孙乐天也被捕。

在监狱里，虽然敌人用各种酷刑折磨他们，可是他们在日寇面前坚贞不屈，没有泄露组织的任何机密。敌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条件下，把关押一百零三天的谭连成和关押十五天的孙乐天同时释放。释放后，孙乐天被组织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敌工部继续从事抗日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任北京华北军区营管科科长，一九五四年转业到北京市，担任北京市租赁公司经理和旅店服务处经理。谭连成被释放后，仍经营照像业，解放后谭连成担任北京白雪照像馆经理工作。

在十年浩劫中，这两位一生为革命、忠于党的老同志，遭到迫害，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与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谭连成和孙乐天这两位革命老人，因患病先后在北京逝世，孙乐天同志的骨灰已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两位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他们战斗过的地方——齐齐哈尔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道镇军民抗击日军纪实

黄庆福 曲禄福 梁亦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不断把战火推向东北各地。于一九三二年农历十月的一天上午，占领海伦的日军，派出一批飞机，对三道镇街里进行野蛮轰炸。第一颗炸弹投到西烧锅院内，轰隆一声巨响，弹片四起，当即炸死烧锅喂牛工人“田牛倌”，李士彦屯（今众心村）的姜洪元赶一辆马车正在西仓库卸小麦时四匹马全被炸死，还炸死烧锅三头牛。接着敌机飞到十字街西侧（今农杂商店门前）又扔下第二颗炸弹，炸死海伦界一个姓姜的，还炸死一个掌鞋匠。第三颗炸弹投到老顺家的后院（今草袋厂处），炸毁三间民房，当即起火，临近商店与居民家的玻璃都被震碎了。第四颗炸弹投到李大不管车店，炸弹未响。敌机投下四颗炸弹后，便向海伦方向飞去。街里的商店、工厂大部分关门停业了，闹得人心惶惶。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又从海伦方向飞来一架飞机，在三道镇上空盘旋，在东北二道街李大北方家上空投下一颗炸弹，炸毁民房三间，炸死一名姓董的老乡。然后向海伦方向飞去。傍晚由三道镇商会宁守田到各家送信说：“日本鬼子从海伦向三道镇出发了，能躲就躲一躲，以免遭受日本鬼子祸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居民携儿带女，有的挑担，有的背包，急急忙忙向北门外、西门外和南门外逃走，到夜晚几乎走光了。

当天晚上，驻守在西大营的霍刚炮团听说日本鬼子要来进犯，他们及时派兵侦察，拉着大炮开赴前沿阵地，进驻东门外张大房子屯（今合心村）。这天晚上日本侵略军，派出一百多名地面部队，从通肯河大桥偷偷

侵入徐福礼屯（今联心村距张大房子四华里），在周围架设铁丝网，在一个小庙跟前挖了许多掩体，利用这个居高临下的地形，不断向三道镇开枪开炮，进行挑衅。正当霍刚团官兵开炮还击之际，杨大房子（今利华村）的爱国“黄枪会”（属五台山佛教会）三百余名男女会员，出于抗日救国之心，在法师车平起、理事杨万录的主持下铺坛练枪练法，准备直捣海伦日军老巢。可是日军已入侵三道镇徐福礼屯，黄枪会不得不决定先打近敌，后打远敌。他们商议后，马上向“黄枪会”会员作战前动员，当场就有一百名会员自愿报名，参加杀敌，然后由法师车平起，向会员发出抗日令：1、出征时，要戒烟、戒酒，听从指挥。2、肩扛黄缨枪，杀敌要真诚。

于农历十月十九日下午，法师车平起，手持七星宝剑，在前引路，会员们肩扛黄缨枪，打起一面“替天行道”的大黄旗，从杨大房子出发，路经张经管、谷家油坊、傅家、王义千和车家屯等地，到达三道镇北门，镇商会带人迎接入城。晚饭后，当夜幕来临时，车平起与主要几名会员在研究杀敌时间、路线。会员们有的练法、练功，有的放哨看守城门，以防敌人偷袭。

农历十月二十日晨，在法师车平起统帅下，一百来名会员吃符上法，肩扛黄缨枪，斗志昂扬，一鼓作气，冲出三道镇东门，直奔徐福礼屯日军驻地。当行至距日军前沿阵地不远时，忽然发现四个日本哨兵，骑着马，手持红、黄二旗，一边摇动旗子阻止黄枪会前进，一边向黄枪会会员喊话：“你们是抗日的，还是随口的？”法师车平起挺身而

出，激昂地回答：“我们是抗日的！”随着车平起的有力回答，黄枪会的旗手将大旗用力一摆，顿时杀声震耳，手持黄缨枪的男女会员，虎目圆睁，齐向日军哨兵扑去，哨兵见势不妙，惊慌失措拨马回逃。此间，黄枪会会员立即猛冲过去，闯入日军前沿阵地，用长枪、大刀与日军冲杀到一起，会员以“头可断、血可流、家乡山河不可丢”的崇高爱国热情，与日军展开搏斗，刺死挑伤日军多人，日军动用机枪扫射，使抗日健儿伤亡六十余人。仅法师车平起家就牺牲三人，理事杨万禄家牺牲四人，伤二人，由莽乃公前来杨大房子批法的候广义等五名佛教徒，因同会员一起参战壮烈牺牲。这时日军手端刺刀，猫着腰，鬼鬼祟祟，胆战心惊，来到屯西头，四处张望，象一群野狼似的扑向阵地。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对负伤的会员，添枪添刀，活活给杀死，而负了伤的会员，心怀祖国，英勇不惧。如法师车平起大女儿（喜儿）身虽负重伤，但见到日本鬼子来刺杀时，她怒火高万丈，想跃身而起，与敌拼搏，终因体力不行，被万恶的日本鬼子用刺刀从阴部挑到胸部，壮烈牺牲。

霍刚炮团为了支援黄枪会的杀敌行动，立即命令炮兵开炮，头一炮把日军阵地的小庙给端了，第二炮把屯头徐老太太的坟给炸开了。第三炮、四炮、五炮、六炮……全都打到鬼子住的大院里，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死的死，伤的伤，死伤四十余人，军马二十多匹，一台弹药车被炸起火，给了敌军严厉的惩罚。敌军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鬼子用炮还击时，由于惊慌失措，胡乱打炮，我军无一伤亡，当地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后因拜泉、明水两县军事吃紧，民军奉命撤离，敌军乘虚而入，施展假兵计，借以恫吓爱国军民，在三道镇外住一宿，而后撤回海伦。

拜泉县政协供稿

万宝山红枪会 抗日灭匪记

曲禄福 梁亦征

万宝山是拜泉县华光乡建筑村所在地，位于县城偏南五十余华里，它四面丘陵起伏，灌木丛生，村落稀疏，交通不畅。在旧中国时期，万宝山一带，土匪活动猖狂，称这里为“土匪窝”，四周的一些惯匪，就是利用这个地处偏僻和天然的丘陵林带，常集中于此，拦路抢劫，胡作非为，当地老百姓和来往行人都深受其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把战火推向东北各地，隐蔽在万宝山一带的惯匪，乘机公开露面，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扯大旗，报字号，拦路抢劫，到处绑票，走门串户，收割民财，杀猪宰羊，打骂群众，弄得人民流离失所，生活不得安宁。当时人们对世道混乱极为不满，曾编出了歌谣：

出了拜泉县，难过侯家店（今兴国乡自利村），

除非长翅膀，能飞过杨乡长（今华光乡万宝山村），

连跑带颠，能过侯宝山（今兴国乡合顺村），

时气若背，过不了赵老贵（今华光乡万宝山村），

人要倒霉，过不了程连奎（今三道付业村）。

你要时气丧，过不了国家岗（今华光乡

向荣村)。

当时万宝山一带人民，目睹日寇疯狂入侵，土匪乘机抢劫，无不为之愤慨，万宝山的一些爱祖国爱家乡的英雄儿女，由陈久思反复宣传动员，组成红枪会“抗日灭匪”队伍。

陈久思是久居本地的一个普通农民，是一个信佛的教徒，他对兵灾匪患极为痛恨。一天有个报字“九江龙”的土匪头子，命小股土匪赵柜屯“搬江子”（打猪）。猪被打死后，土匪到处抓人抬猪，全屯老少儿乎跑光，没找到一人，土匪看陈久思家里有人，就闯进去抓人抬猪，双方发生了冲突，陈久思一怒之下，命两个儿子手持长枪和棍棒，冲出房门，将进来的一名土匪打死在院内。院外正在打猪的几个匪徒闻风而逃。法师陈久思以佛教徒的身份，抓住群众抗日灭匪的共同心愿，到处游说“抗日灭匪、救国救民”的道理，深得人心，人们奔走相告，拥护红枪会的正义主张，一下子就有一百多有志气的男女青年前来报名参加红枪会。

一九三二年阴历八月，万宝山红枪会正式成立了。会员们在法师陈久思的指挥下，每人手持红缨枪，昼夜不停地进行登坛拜佛、练法练刀，从而一支强有力的抗日灭匪、敢打敢冲的红枪会队伍应运而生。他们高举“替天行道，扶正压邪”的大旗，展开了“抗日灭匪”活动。

“抗日”就是打击外患，反对日寇的疯狂入侵；“灭匪”，就是消灭内患，铲除土匪四处抢劫，伤害黎民罪行。因而红枪会第一步就是立足于消灭内患，认为土匪一日不消灭，人民一日就不得安宁。并提出“擒贼先擒王”的口号，随之，四处出征，搜捕土匪。当红枪会出征到牛家粉坊（今三道镇久胜村）时，土匪闻讯吓得四处逃窜，老匪首“九江龙”被红枪会活捉，地主沈三秧子到红枪会找陈久思说情，如果放了“九江

龙”，要啥给啥，要烟土给烟土，要钱给钱，情愿担保。陈久思当面拒绝说：“我们是替天行道，铁面无私，不讲情面。”当时就把沈三秧子赶了出去。之后，便将匪首“九江龙”杀死在赵木匠屯（今万宝山村）西柳条通里。相继在万宝山一带连续活捉了“金山”、“飞龙”等五个匪首。一些土匪从此闻风丧胆，有的逃跑，有的隐藏起来，不敢再来为非作歹。红枪会打土匪的声威越来越高，为民除害的举动受到广大群众一致拥护，大快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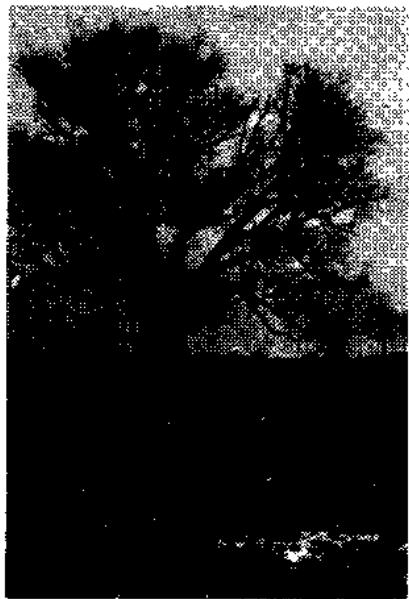
正当灭匪初战获胜时，陈久思获悉日寇从海伦要进犯拜泉的消息，为了保卫家乡，决心调转枪头，组织力量，打击日寇入侵。

为了激发红枪会全体会员的抗日斗志，精选出一百二十名有爱国精神，有战斗本领的青年会员，奔赴抗日第一线。为了加强行军纪律，把出征的会员组建成一个大队，下设五个小队，打起了“吞日立国、另安天下”的八字大旗，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拂晓，在法师陈久思带领下出发了。当行军到赵木匠屯西南沟时，法师下令举行祭刀仪式，将在押的五个匪首作为祭刀品，令其按“中央戊己土”的布阵，挨次跪在其中，当时以放鞭为令，由法师带领向匪首身上各刺一枪，五名匪首被刺死，祭刀成功，大害清除，人民欢腾。广大群众一致欢呼红枪会是人民的救星。红枪会祭刀仪式完了，经三道镇向海伦进发。九月十日午夜，行至海伦县透眼井时，打尖吃饭，饭后继续前进，九月十一日天刚放亮便到达海伦。会员手持大刀长枪，越土壕，跳板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死了正在守卫的四名日军，继而蜂拥而上，随着一阵刀砍和刺杀声，一鼓作气冲到广信公司楼下，一瞬间把正在酣睡的二十余名日军全部刺死在楼内。这时二楼上的日军朦胧中被惊醒，战战兢兢

（下转18页）

“日本沟”的由来

郑墨庚 杨树明 马云



一九三三年，在被当地群众打死八个鬼子的地方，日本侵略者立了个“祭碑”。此碑在“九三”光复后，被当地群众砸碎，现在树前仍残存着水泥块。

甘南县中兴乡建设村岳家屯有处山沟，周围群众都叫它“日本沟”。在堂堂的中国领土上为什么出了个“日本沟”呢？说起这个名称的由来，还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呢。

五十多年前，即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午间，一架由西向东的日本飞机，摇摇欲坠地飞入甘南县中兴乡附近上空，在发出了几声轰响以后，一头栽到北尖山子处。落到尖山处的这架飞机，名字叫“板仓

号”，它为什么落到这远离机场的荒郊野外呢？

原来“板仓号”不是一般的客机，它隔日一次，来往于齐齐哈尔和海拉尔之间，表面载人送客，明来明去，实际上鬼鬼祟祟，暗藏杀机。

当时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城，一年前马占山率领爱国军民进行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抗日爱国将领苏炳文、张殿九的部队都参加过这场使日寇闻风丧胆的战役。他们的部队训练有素，战场上奋勇杀敌，顽强抗日，曾受到去前线视察战况的马占山的嘉奖。到了一九三二年二月，马占山一度与日寇妥协，黑龙江省挂上了“满洲国”国旗，嫩江以东的大片领土终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可是当时苏炳文、张殿九为首的护路军有相当的实力，驻防于海拉尔、满洲里为中心的嫩西一带，所以日寇未敢贸然进驻海、满。

日本侵略者视苏、张二旅如鲠喉鱼刺，但一时又无兴兵围歼的条件，只好变换手法，软硬兼施，想把苏、张二旅拉到自己樊篱之中。可是苏、张对于日寇的重金收买、封官许愿的一套伎俩，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使敌人无可奈何。这就更增加日寇的疑惧，认为苏、张二旅怀有敌意，就以警戒苏联为名，要求派入“国境警察队”进驻海、满。为了整个抗日时局的需要，苏、张同意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由中、日、朝三种人组成的一百二十人“国境警察队”进入海拉尔和满洲里。

这支“国境警察队”名义上是警戒建立不久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实际是打入苏、张二旅腹地的有合法身份的特务机构。他们的任务是在海、满一带四处搜集苏、张二旅的情报，并且及时地把这些情报送回齐齐哈尔大本营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而担任递送情报的“信使”，便是这架隔日一次准时往